

资源再平衡 诊治城市病②

追涨学区房 纠结父母心

委员表示治理择校乱象不能光靠“末端治理”，要打组合拳

教育部2月17日印发“通知”，要求北京、上海等19个重点城市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方案；到2015年，19个城市实行100%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，90%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。尽管教育部只是重申多年前的政策，可全国学区房应声而涨。据《半月谈》报道，教育部通知一出，天津、长春、南京、广州等地的学区房市场迅速升温。

政协委员表示，治理择校乱象不能光靠“末端治理”，教育综合改革需要统筹设计，打组合拳。

记者调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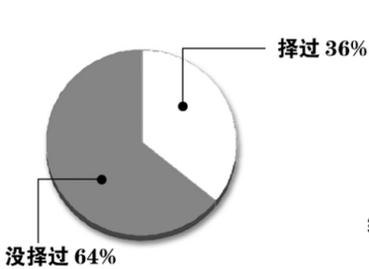
与同等条件房源相比——沪学区房价高20%

记者从中原地产公司了解到，3月份以来，上海学区房挂牌量与年前相比略有上涨，挂牌价涨幅在5%左右，成交量环比上月增加一到两成。由于中心城区学区房普遍供不应求，成交价基本没有议价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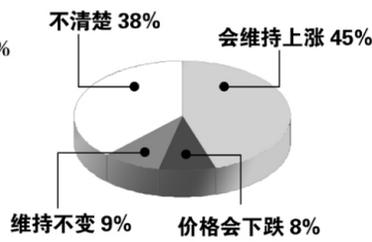
上海较热的学区房集中在浦东洋泾板块、徐汇徐家汇板块、静安新闻板块、杨浦黄兴板块等，价格普遍高出同等区位同等条件房源20%。上海中心城区教育资源比较丰富，家长趋之若鹜。根据记者调查，市中心学区房购买中单纯为了挂户口进学校的现象颇为普遍，由来已久。不过，购买学区房也暗藏风险：学区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根据学校的承受能力，以及片区里应入学的学生数量而动态调整，有时候会出现今年学区而明年就被划出的情况。

本报记者 何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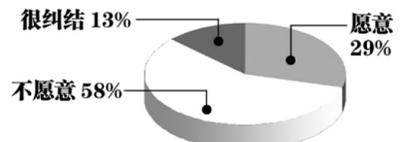
您为孩子(子女的孩子)择过校吗?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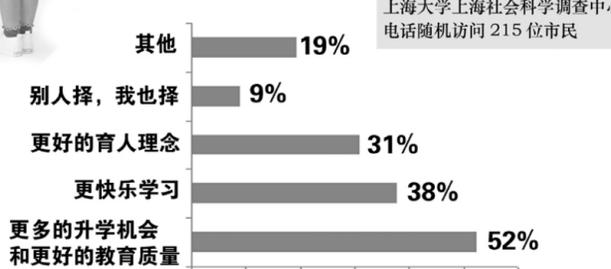
您如何看待“学区房”价格走向?



您愿意为孩子(子女的孩子)择校购买“学区房”吗?



择校标准



数据来源: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电话随机访问215位市民

制图:冯晓瑜

百姓故事

拿100多平米换50平米房子

市民坦言为了孩子没办法

从怀孕起,林小姐就惦记着换学区房。如今宝宝出生9个月了,林小姐很着急:“学区房都在涨价,再不换就晚了。”丈夫很犹豫:如果换学区房,房子必然要变小,生活质量会下降,“值不值呢?”

如孟母一般,林小姐坚信好的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。她看好的是教育资源丰富的徐汇区。在某媒体官网上,林小姐还查到,市教委重申的就近入学原则中有一条:如果登记报名的多、招生计划少,就优先安排户籍和住所一致的孩子,然后再安排户籍分离的孩子。林小姐曾到徐汇区长桥一带看房,这里的学区房跟非学区房价格泾渭分明;相距1公里左右,同品质的房子单价差1万多元。林小姐算了一下,必须要把近郊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卖掉,再贷点款,凑齐300多万元,才能买得起长桥地区5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。

“谁不希望住大房子,为了孩子没办法。”林小姐说自己并非个案,身边的同龄人也在换房。2月17日,林小姐一看到教育部下发布的通知,大脑里那根“学区房片区”的神经又被狠狠拨动了一下,“这肯定会加速大家往好的资源周边集聚”。她觉得,学区房在各类房子中价格最坚挺——公认优质的教学资源就这么点,这房价拴上了父母心,肯定只涨不跌。

本报记者 刘力源

完善顶层设计推进公办学校均衡化

选择性教育必须由市场提供

会场声音

全国政协委员、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、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

“尽管现在还没到招生季节,但择校的热潮已悄然涌动,家长们忙着找关系、递条子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、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预测,今年上海好学校的报名录取比例或将达到10:1。

无论是“条子生”还是学区房,根源都在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广大群众的旺盛需求之间的矛盾。胡卫说,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必须结合实际,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来推进公办学校的均衡化,选择性教育必须由市场来提供。

资源不能向少数公办名校倾斜

“公办基础教育是政府行为,出发点是公平,重点是面向大多数,强调的是公益性,落脚点基本保障。”胡卫直言,尽管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生均经费已差距不大,但很多财政经费都以专项经费的名义向传统的公办名校倾斜,譬如大型基建项目、设备设施项目、特色建设项目等,“公办义务教育要均衡,除

了生均经费要标准化外,要逐步减少专项拨款,要强调‘大生均’的概念。”

在胡卫看来,义务教育教育应强调标准化。他告诉记者,韩国为了推进划片就近入学政策,在1968年便将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的标准化、均衡化发展作为文教政策的根本任务,制定了详细的标准,并将教师、设施、财政等因素作为均衡化的重点,然后对每一所学校普查评估。

“择校就是择师,优质的师资是学生和家长最为看重的。”胡卫表示,上海有较为丰富的传统教育资源,特别是在传统名校,有大量的名师积淀,不能简单地均衡师资,而要提高整体师资队伍素质,通过高质量的教研活动来提高师资水平的底座。

教育也可以探索混合所有制

要真正缓解择校热,必须两条腿走路,一方面是政府举办的公办学校要实现义务教育的高位均衡;另一方面,高质量、选择性、稀缺性的教育需求只能通过公办之外的学校来提供,所谓“公办不择校,择校不公办”。

“我们的顶层设计还有空间。”胡卫认为,要有好的空间、好的政策和好的土壤,让社会资金投入教育,使私立教育发展起来,从而调动政府、社会、学校三方面的积极性。

对家长选择热门公办学校的问题,可以通过制度设计,探索混合所有制的教育模式,比如引入社会资金,使这些学校转制成为“公办民助”或“民办公助”学校。通过放开收费,满足社会家长的择校需求,这些学校的发展不应继续占用公共财政,而是应当依靠社会资本入股来完成。对这些热门学校,可以允许他们自主地设定入学标准。这些入学标准绝不是以提高收费为主,而是应当综合考虑科学设计。转制后可以吸引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,而对于学习成绩好,有学习特长的学生,则可以通过奖学金、助学金、贷学金的方式帮助他们完成学业。

胡卫认为,调动市场的力量兴办民办教育,在扩大教育资源总量的同时,公共财政可以更多地用于促进教育公平,更多地向薄弱地区、薄弱学校、困难群体倾斜。

应防止政府对教育大包大揽

令人遗憾的是,最近一段时间,社会资金进入民办学校的比例在降低,全国范围都是如此。2002年到2011年9年间,我国全社会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由4.55%增长为5.05%,其中,财政性投入增长了1.03个百分点,而非财政性投入却下降了0.53个百分点。在上海,社会资金投入教育的比例也在大大减少。胡卫说,

有一段时间,国家对于民办教育的政策不明朗,对社会资金没有吸引力,“那段时间,在国家公共财政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后,就出现了一种观点:还要不要民办学校?民办学校还有没有价值?政府有钱了,行政权力在部分地方不断集中,有些教育主管部门认为教育是自家的事,出现了教育包办包办的现象。”

胡卫认为,三中全会之后,这个观点应该被扭转。政府应当将办教育的权力下放,鼓励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,发挥民办教育办学主体的积极性。“不能有了方向,没有配套的制度和政策。”胡卫举例说,教师的身份问题就迫切需要解决,“民办学校老师的编制属于非编企业,公办则为事业编制,这样民办教育如何留住老师?”

“中国的教育就像一只鸟,它的双腿是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,双腿都健壮才跑得快。”胡卫认为,一个区域合理的教育结构应该是:由政府主导下,公办教育以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为主,民办教育以提供选择性教育为主。当公办教育质量提升,均衡发展,民办学校特色多样、丰富多彩时,教育才会满足人民的多元化需求,就近入学才会真正得以实现。

本报特派记者 李上海



他,“开炮”很猛,却鲜有人知其意见采纳率很高。他,向政府说“真话”,也对极端舆论说“真话”。他,微博只关注了一个账号,却有近百万粉丝。

葛剑雄:“我是接地气的”

案:他为考研泄题当面质问教育部,一年后,他仍高票当选全国政协委员。人们因此对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好奇:他何以如此敢言?又何以总是能在敢言的同时收获良好的效果?

3日晚上,在葛剑雄下榻的北京国际饭店房间内,记者与他畅谈1小时。葛剑雄说得最多的是两句话:一是必须灵活掌握“度”,底线是遵守宪法、法律的规定以及政协的章程;二是要“区分情况”。他说:“个案事情不提,顶多说说意见;一般社情民意,不必在会上说,通过全国政协常委会或其他渠道传递就能解决。(走程序)要越快越好;提案也要区分情况,有的提案注明需要答复,有的就不用答复。”

葛剑雄是学者。他说,不管国家出台政策,还是委员撰写提案,都应该有调查和基本的依据。他的提案言简意赅,都只有几百字而已——当年的全国优秀提案,全文仅612字。他说:“有些提案是要解决问题,有些是向领导人传递情况——他们看到了,目的也就达到了。”

两会人物素描

葛剑雄不改敢言本色。今年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前,他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,“取消英语缺少依据,高考改革走错了路”。虽然葛剑雄并未就此撰写提案,但已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
很多人都觉得葛氏“开炮”很猛,却不知道他的意见采纳率很高,而且效果很好。2010年,他建议设立中国旅游日,其后果然成功;2012年,他递交《关于全面完善义务教育制教育的提案》,当年获评全国政协优秀提

剑雄本在闽北古田中学教书,后被借到公安部门工作。后来,他还进过农场、管过监狱。这段经历令他谙熟人际关系的处理:“我是接地气的。别人骗不了我,我也不轻易被媒体所左右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,葛剑雄逐渐开始参政议政。那时,“两会”等制度刚刚恢复,不少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都不会写意见、提案。葛剑雄是人大代表,他提的第一个意见是请全市电影院恢复学生票。由于意见具有操作性,很快就得到落实,后来《光明日报》专门报道此事。葛剑雄特意强调:“我算过账——按当时的电影票价,这件事费不了政府多少钱,操作性强。”

1999年,葛剑雄加入民革,后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。他说:“我的提案针对‘不大不小’的事。太大的事,我呼吁解决不了,太大的案也不合适。”后来,他提出火车站地下车库停车收费问题、出租车司机如厕难问题……均得到了妥善解决。

今年全国“两会”,葛剑雄以社情民意的形式建议“不要将对党政机关的规定扩大至事业单位和教科文卫界”,“对‘既得利益’

要具体分析、区别对待”。这与他往昔“对撼政府部门”的形象有些不同,难免有人质疑他为“体制内”代言。葛剑雄理直气壮:“我是公立大学教授、全国政协委员,当然是体制内的一员。政协本身汇集了不同立场的人,难道在体制内就不能提出好建议?”

葛剑雄坦言,在改革推向纵深的过程中,政府对于批评和建议正表现出相当的“雅量”;但是,社会舆论却出现了一种极端化的苗头。因此,他的“真话”,不仅要对官员们说,也要对公众舆论说,同样的话都需要“度”。葛剑雄的微博只关注了1个账号(复旦大学图书馆),但却有999790个粉丝。他的原则是:即便持不同立场,只要不骂人,就决不“拉黑”网友。一次,一名网友在葛剑雄的微博中批评另一位著名教授,还附了一幅丑化漫画。葛剑雄删除了这条留言,给网友发了一条私信说明;后来,网友向他道歉。时间长了,该网友在微博上的言论渐趋理性。

葛剑雄说,协商与妥协,本是政协委员参政的题中应有之义。他翻开本届会议的政协工作报告,用食指指出这一句话——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,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,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,“我非常赞同!”

本报特派记者 沈竹士 绘图:冯晓瑜

昨天,出席人代会的上海市代表团在京西宾馆会议室讨论提出议案和建议。冯军、张维华、马须伦、王战等10多名代表先后介绍了拟提交的意见或建议,争取其他代表的附议。“拉票战”进行到精彩处,现场不时响起掌声。

记者注意到,现场共有4位代表关注了环保议题。冯军代表建议修改节能降耗法,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高节能效率;张兆安代表建议制定清洁空气法,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;医疗界的贾伟平代表提议修改环保法;金东寒代表建议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,提高内河船舶的废气排放标准。

自中央打出系列组合拳反“四风”以来,“公务员不好当”的声音一度占据舆论中心。在各方猜想的“公务员离职潮”中,工资收入不合理是主要原因之一。全国人大代表、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表示,公务员收入中工资和津补贴的比例为2:8——工资太少,津贴太多。这个扭曲的工资制度确有改革的必要。

前段时间,常有公务员在媒体和网络上“吐槽”工资太低,收获许多同情,但也有人认为公务员太“矫情”,“晒”出来的只是账面工资。这部分观点自有其道理,王战在提交人代会的书面意见中指出,中国公务员工资水平不高,但实际收入不低——公务员收入中70%到80%来自津补贴,工资占比仅有20%到30%。

王战介绍,2006年国家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提出“地区津贴制度”,使得目前的“津补贴”成为公务员收入的主体部分,公务员工资中工作津贴和生活津贴的发放名目繁多,乱象丛生,既严重扰乱收入分配秩序,又不符合国家规定。工资制度的扭曲引发种种弊端,尤其严重的是,工资收入对公务员集体行政效率的激励不足,导致变相产生和过度使用“三公”经费,滋生寻租和腐败。

公务员收入同级别待遇挂钩,按照级别高低决定福利大小和收入高低,即所谓的“五年一晋级,两年一晋档”,缺乏同管理技能、业务技能、工龄等非职务因素相联系的增长机制。王战说,级别越高的公务员,可支配的“三公”经费就越多,可享有的特殊待遇也越多。公车改革之所以艰难,固然有补贴标准设计不合理的原因,但官场的特权思想与官员间的互相攀比也是重要原因。

王战建议推动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,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。他的设想是以“三公”经费改革为契机,推动公务员工资改革联动突破,“既要加法也要减法”,“三公”经费和津补贴主要做减法,工资和奖金部分做加法。”

“引入自我激励和市场激励,使压缩‘三公’经费开支和增加公务员收入互为目标,实现两者的联动;坚持效率导向原则,通过工资改革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,提高行政效率,形成对公务员的正向激励,确保公务员工资水平与社会进步相适应。”王战所说的“联动”改革还包括增加公务员收入的透明度,为公开“三公”经费并逐步过渡到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预留政策衔接口。

本报特派记者 钱蓓



昨天,上海代表团在驻地举行代表团会议。王战代表提出《关于“三公”经费和公务员工资联动改革的建议》成为会场热点。会议结束后,媒体记者竞相采访。本报特派记者 叶展亮摄

赵冬苓代表提出——5年之内应逐步实现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

“进入新时期,全国人大将更好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,重点加强对新税种的立法,包括社会上关注较多的房地产税和环境保护税的立法工作。”昨天,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发言人傅莹,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对社会关注的税收法定问题作出回应。去年全国两会上,全国人大代表、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艺术总监赵冬苓曾联合31位代表提交《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或者条例的议案》。

“去年,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给我的议案书面回复中说,对‘税收法定’的问题已经有所关注,但目前并没有路线图和时间表。”赵冬苓认为,“我也知道,这件事不可能一蹴而就。我在今年准备提交的议案中提出,全国人大应在5年内收回税收立法权。”

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可以有两条路径:一是直接废止,即择机废止包含“设税授权”在内的“1985年授权决定”;二是间接收回,即尽快把现行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。“凡是新增税种,都必须经过人大立法程序,并且广泛征求社会的意见和建议,充分体现公众意见。”赵冬苓建议,国务院修改现行税收暂行条例时,只能减税不能增税,不能扩大授权;同时,还应现行税收条例加以梳理并进行分类处理,对于征税目的不合理或者重复征税比较严重且收入比较少的税种,如印花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或者具有税收特征的行政收费,如教育费附加等,可以考虑取消或者合并到其他税种。她还建议,可将少数适合地方立法和授权的税种划分出来,如房地产税,在条件比较好的省、市尝试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税收立法权,由地方人大决定开征或者停征。

收回税收立法权后,立法部门可能压力倍增。对此,赵冬苓建议,全国人大一方面应增加编制和专家数量,提高立法专业能力;另一方面则应开门立法,委托财税专家组织专门研究团队负责起草具体税种的立法草案,解决立法机关力量不足的问题。

本报特派记者 刘栋



两会经济观察